

明代文人辨析

陳 寶 良*

摘 要

本文旨在梳理文人概念的形成及其變遷，明代文人群體的壯大，並對文人與文臣、道學家、武士之差別或聯繫作適當的辨析，進而對明代文人的特徵及其影響作出恰如其分的評估。作者認為，明代文人固然是知識階層的一部分，具有知識階層所具有的一切共性，卻又是獨具特點的一個社會階層。一至晚明，由於龐大的山人或布衣文人層的存在，文人已從士人階層中脫穎而出，並成為不同於文臣、道學家、武士，即自具個性特徵、人格追求、生活方式的群體。從廣義的角度來說，文人與文臣、道學家之間並無差別，均屬儒家知識階層亦即「士」的一分子。然從狹義的角度來說，文人與文臣、道學家之間又多有不同。在明代，文人與文臣、道學家、武士之間，又別具一種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關係。晚明士人主體意識的高漲，士人生活的漸趨活躍，文化的多姿多彩，無不與這些純粹的文人有關，而與儒家學者或道學家之流無涉。作者進而認為，即使是純粹的文人業餘精神，在晚明也受到整體文化世俗化的影響，表現出一些俗化傾向。

關鍵詞：文人、文臣、道學家、武士、明代

一、前 言

說到文人，無疑讓人感到是一個饒有興味的題目。一方面，文人既是一個相當古老而又傳統的稱謂，卻又被後來的研究者提出的「士」、「士大

* 作者原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編審，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夫」、紳士（或鄉紳）或「知識分子」等概念所湮沒而不甚彰顯；¹另一方面，由於史書中分設「儒林」、「文苑」二傳，使傳統的「儒」或「士」階層發生不可避免的分化，從而導致了儒士、文人的分野，以及文人地位的提高或相對下降。

考以文人為題並就其生活進行研究者，魯迅堪稱開風氣之先。其《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²無疑拓寬了文學研究領域，並為後人提供了研究同類課題的範例。繼之者有王瑤《中古文人生活》，³李志慧《唐代文苑風尚》，⁴沈松勤《北宋文人與黨爭——中國士大夫群體研究之一》，⁵么書儀之《元代文人心態》與吳秀卿之「元代文人故事劇研究」，⁶均為斷代文人及其相關作品、黨爭、生活、風尚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關明代文人的研究，郭紹虞《明代的文人集團》、《明代文人結社年表》二文，⁷顯然也是創闢之作，並首先注意到明代文人不同於前代文人的基本特點，也即結社、集團化傾向；繼之者有謝興堯《談明季山人》一文，⁸對明代文人中的特殊階層即山

- 1 王廣武在《中國社會中的學者：歷史背景》一文中，通過對中國人有影響的學問類型加以辨別，對中國的傳統學者進行分類，以便使他們的主要特徵可以顯示得更清楚一些。他將學者分為聖賢型、九品型、流外型、遺民型四種。說見氏著、姚楠編譯《歷史的功能》（香港：中華書局，1990），頁118-119。這是頗具啟發性的分類方法。然筆者作此文的用意卻稍有不同，而是擬將文人從傳統的知識階層（當然也包括各種各樣的學者）中分析出來，給以單獨的考察。
- 2 見吳子敏、徐迺翔、馬良春編，《魯迅論文學與藝術》（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上冊，頁251-265。
- 3 王瑤，《中古文人生活》，收於氏著，《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按：在日本學者石川忠久教授的主持下，曾將王氏《中古文學思想》與《中古文人生活》一書中多篇文字予以譯，改名《中國之文人》，在日本出版。見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重版題記，頁1。
- 4 李志慧，《唐代文苑風尚》（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
- 5 沈松勤，《北宋文人與黨爭——中國士大夫群體研究之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6 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又吳秀卿，「元代文人故事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6）。
- 7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498-512、518-610。
- 8 謝興堯，《堪隱齋隨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238-242。按：謝氏此文作於20世紀40年代。日本學者鈴木正《明代山人考》（見《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一文，是較早的一篇系統研究明代山人的論文。而對明代山人進行個案研究者，其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則為李鳳萍「晚明山人陳眉公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4）一文。

人給以充分的注意；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一文，⁹更是以晚明小品、山人為考察的主要對象，對明季文人的生活作了系統化的梳理，不失為一篇研究明代文人及其生活的典範之作；黃繼持《明代中葉文人型態》一文，¹⁰將明代文人細括為傳統式的「儒家文人」和以文墨為尚的「純文人」兩種，指出由於民間文人的大量出現，明代的「純文人」固然與前代有所承接，但其新異之點也不容忽視，而明中葉正是這種型態的成熟時期；而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一書，¹¹以晚明世風為背景，悉心探討了晚明士風與文風的發展關係，事實上也是以文人為主要研究對象；而近年來吳智和、陳冠至對蘇州文人集團的生活，以及蘇州地域藏書及藏書家的個案研究，¹²說明學術界對明代文人的研究已漸趨深化。

值得指出的是，一至明代（尤其是晚明），文人已從士人階層中脫穎而出，並成為不同於文臣、道學家、武士，即自具個性特徵、人格追求、生活方式的群體。換言之，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文人與文臣、道學家之間並無差別，均屬儒家知識階層亦即「士」的一分子。¹³譬如，號稱有明代科舉社會背景的清人吳敬梓著小說《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文人社會」，就包括學者、詩人、八股文選家以及另外一些知識人的混合體。¹⁴然從狹義的角度來說，文人與文臣、道學家之間又多有不同。當然，這一特點並不能成為誇大其間差別的理由。事實上，在明代，文人與文臣、道學家、武士之間，又別

9 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收於氏著，《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頁37-83。

10 見趙令揚主編，《明清史集刊》（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1985），第1卷，頁37-61。

11 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12 吳智和，《明代蘇州社區鄉土生活史舉隅——以文人集團為例》，見東吳大學歷史系編，《方志學與社區鄉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頁23-48；又陳冠至，「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與藏書生活」（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1-263。

13 關於士之起源，自古即分為文字學及歷史學兩派。儘管就士的起源有不同的解釋，但若「以一項已知的歷史事實作為討論的起點」，那麼，「古代知識階層始於春秋、戰國之交的孔子時代」，這一點則毋庸置疑。相關闡述，可分見：黃景進，《社會變遷中的知識份子》，見《漢學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頁17-19；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4。

14 Stephen J. Roddy, *Literati Identity and Its Fictional Represent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

具一種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關係。恰恰是在這些問題上，前人或缺乏研究，或有所涉及，卻又語焉未詳，甚至混淆其間的關係，或者過分強調其間的差別。職是之故，本文旨在梳理文人概念的形成及其變遷，明代文人群體的壯大，並對文人與文臣、道學家、武士之差別或聯繫作適當的辨析，進而對明代文人的特徵及其影響作出恰如其分的評估。

二、文人概念及其演變

關於文人的定義，過去的論者甚多，概言之，大體不外廣義或狹義兩種：

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說。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只限於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之類的作者，古人所謂「詞章家」、「無用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就是。至於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家，儘管也洋洋灑灑發表著大文章，斷乎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夠不上武人的資格。¹⁵

由上述錢鍾書之說不難發現，文人有廣義、狹義二說。所謂廣義的文人，即與武人相對者，可指一切舞文弄墨之人。顏崑陽之說無疑又為廣義文人提供了另一佐證：

「文」相對於「武」，「文人」即是指以文學寫作作為能事之人，而「文學」不是狹義地指辭章寫作，而是廣義地指非武力爭戰之一切文化實踐及知識活動，辭章寫作當然包括在內。¹⁶

顯然，除了與武人相區別之外，文人可以包括從事一切文化實踐及知識活動的人。從這種意義上說，文人亦即知識分子的代名詞，¹⁷ 或者可以稱之為「斯文」一脈。¹⁸

15 錢鍾書，論文人，見氏著《寫在人生邊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74。

16 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見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210。

17 譬如周天論文人道：「文人，也即知識份子，在封建社會裏，除了極少數例外情況，大致是統治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統治階級中的一個特定階層。」說見氏著，《文人的悲劇》（西安：華嶽文藝出版社，1988），頁3。而么書儀也認為，文人與現代的「知識分子」概念有著某些共同點。說見《元代文人心態》，幾點說明，頁1-3。

18 狄百瑞（William T. deBary）認為，「文」這個字還有更廣泛的涵義，它指的是比文藝及美藝的休閒活動更深刻的一些東西。這就是胡瑗說「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的意思。孔子說過他自己的時代與「斯文」相終始，許多新儒家也像孔子一樣地以在現世中重振「斯文」維

從狹義的角度而言，文人應是從傳統的儒、士中分化出來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即知識階層中專事「雕蟲篆刻」的「詞章家」，也就是只限於詩歌、散文、小說、戲曲的作者。狹義的文人，原本只有文人、詩人之別。如明人江盈科言：「從古以來，詩有詩人，文有文人。譬如斫琴者不能制笛，刻玉者不能鑲金。專擅則獨詣，雙驚則兩廢。」¹⁹於是乎詩亦分文人、詩人之詩，一由學力所成，一由鍛煉而得。²⁰自元、明以來，因戲曲、小說相繼出現，遂形成寫作戲曲、小說的專業文人。

在西方，文人與知識分子均可用 intellectual 一詞。然細分之，在此詞義項下，則又有廣義與狹義之別。換言之，就氣質、性格而言，文人在知識分子中亦別具一格。如蘇珊·桑達 (Susan Sontag) 寫有一篇文章，題目叫 'The Last Intellectual'；而 intellectual 就不宜直譯成「知識分子」或「讀書人」，而是指帶點「侷儻」派頭的文人，勉強可以譯成「最後一位名士」。²¹其實在西方學術界，除了以 intellectual 一詞指稱「文人」外，相關的稱謂尚有 gentry、literati、gentry-literati 和 scholar-gentry。美國學者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對此有較好的辨析。按照艾爾曼的觀點，gentry (紳士) 應指傳統中國的儒家精英分子，他們一方面作為地主行使地方社會和經濟權力，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朝廷官僚體制中的官員，從而擁有地方或朝廷的政治權力。

繫道統為畢生之個人責任。字裏行間不難發現「文」及「文人」的廣義性。而日本學者中村元也認為，文人「是知識人，讀書人，同時也是道義承擔者，指導者。中國歷代王朝的官僚，都是從此類文人中選出的。」其說分見狄百瑞著、李弘祺譯，《中國的自由傳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頁 64-65；中村元著、徐復觀譯，《中國人之思維方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頁 101。

19 江盈科，《雪濤詩評 詩文才別》，見氏著，《江盈科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下冊，頁 804。按：明末清初學者李顯亦言：「顧學之自有先後，必本立而後可從事也，否則文古如班、馬，詩高如李、杜，亦不過文人、詩人而已。」說見氏著，《二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36，四書反身錄，頁 477。

20 黃宗羲，《黃梨洲詩文集 文集》，卷 1 後葦碧軒詩，見《傳世藏書 集庫 別集》(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第 12 冊，頁 42。近人的評述，可參見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補訂本)，頁 34。

21 轉見於董橋，《藏書與意識形態》，見氏著，《靜觀的固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頁 86。按：在西方，也有用 literati 一辭作為「文人學士」的通稱。相關的闡述可參見 Jerry Dennerline, *The Chia-ting Loyalists: 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94.

literati (文人學士) 應指紳士中的一部分。他們憑藉經典學問、世系典禮知識和文學作品而成為文化精英，從而擁有他們所具有的一切地位。在通常情況下，gentry 和 literati 的文化地位，均與他們的科名等級有關。換言之，由於專業術語稱謂上的部分一致性，他們又被 gentry-literati (紳士文人或文臣) 或 scholar-gentry (學士) 所取代。²² 可見，文人為紳士層中的一員，但又與紳士同中有異。紳士以科名、官位、土地佔有為憑藉，而純粹文人卻可完全憑藉知識或文學作品。

西方人對文人多有稱讚之語。如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在 *詩的辯護* 裏說文人是「人類的立法者」，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在 *英雄崇拜論* 裏說文人算得上「英雄」。²³ 可見，英美文學傳統中的文人過去深受敬重。然時代發展的結局，也不外乎文人地位的下降，亦即世風一變，文人也慢慢凋零，只剩最後寥寥幾個在應景而已。²⁴

在中國傳統典籍中，「文人」一稱，起源頗早。為示明晰，不妨先將「文」或「文學」進行一番梳理。自殷周以來，「文」字多內涵有「德」的意義，以至春秋時最終形成「文德」一詞。而自春秋以後，「文」又意含「學」之義，漸而成「文學」一詞。考「文學」一詞，最初出現於《論語》的 *先進篇*。孔子將他的高級門人分為四類，而第四類即為擅長文學的子游、子夏。在春秋晚期，「文學」一詞的意義相當於古典，而擅長文學者，亦即所謂的古典家。²⁵ 顯見，文學一詞帶有廣義的特點。文人無疑是「文」或「文學」的創造者。在春秋以前，「文人」一詞，即指有「文德之人」，是一種崇高的道德人格。換言之，當時尚無嚴格意義的文人。至戰國時，文人又用以指文辯之士。²⁶

在傳統中國，狹義甚或純粹意義上的文人，即所謂的詞章家，當出現於漢代。有學者認為，以文人身分創作純文學作品者，當推司馬相如。²⁷ 至東

22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vxii, 注(1)。

23 錢鍾書，*論文人*，《寫在人生邊上》，頁79。

24 V.S. Pritchett 語。轉引自董橋，*文章似酒*，《靜觀的固執》，頁47。

25 季鎮淮，「文」義探原，見氏著，《來之文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26-28。

26 于迎春，《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頁16-17、139。

27 周天，《文人的悲劇》，頁182。

漢，王充重新提出了「文人」這一概念。王充《論衡》超奇篇云：「采綴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²⁸與此同時，王充又提出「文儒」這一概念，顯已表明「文人」這一人物類型已大體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漢書》藝文志之圖書分類，已將經學著作與詩賦歧為二類，經術、文章已有分別。然西漢時雖具文人之格，卻尚無文苑傳。正如錢穆所言：「文苑立傳，事始東京，至是乃有所謂文人者出現。」²⁹自此以後，儒林、文苑在正史中分而列傳，文苑、詞林成為與儒林、道學相對的概念，而學術、文章亦益趨分途，進而學者（或道學家）文人也顯示出不同的性好、習養和所長。

一至明代，文人與學者（尤其是道學家）的區分，尤為明顯。從其淵源來說，文人當脫胎於士和儒。明人譚元春云：「士之有文，猶女之有色；文之有先輩時輩，如色之有故人新人。」³⁰明人謝肇淛也說：「不奇不文，不文不士。」³¹士藉文而增色，而有文之士，則為文士。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亦將工「雕蟲篆刻之技」者稱作「文士」。³²清修《明史》，亦將文苑中人稱為「文士」。³³文士者，即「文學之士」也。按照傳統的說法，三代以上，只有儒之名。漢末，始有「雕蟲壯夫不為之技」，分文苑於外。自宋以後，又增「道學」一門，甚至在道學中又分理學、心學為二。於是，同一儒也，裂而為文苑、儒林、理學、心學。³⁴明人呂柟更是將儒細分為挾術數之「才儒」，閑詩賦之「雅儒」，記雜醜之「博儒」，趨時而競勢之「通儒」，談玄之「高儒」，臨事含糊淹滯之「老儒」，以及蹈性命之言之「理儒」。³⁵顯然，文人已

28 王瑤，玄學與清談，見氏著《中古文人生活》，頁57。

29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轉引自于迎春，《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頁216。

30 譚元春，官子時文稿序，見氏著《鵝灣文草》（長沙：嶽麓書社，1988），頁75。

31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天啟刻本），卷5 史伯仲和鳴篇序，集部第175冊，頁667。

32 顧炎武，《亭林餘集》與陸桴亭割，見氏著《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70。

33 《明史》，卷285 文苑 1（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7307-7308。

34 黃宗羲，《黃梨洲詩文集·文集》，卷1 留別海昌同學序，第12冊，頁47。

35 呂柟，《涇野子內篇》，卷2 雲槐精舍語第三（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3。

僅為眾多儒之中的一色，即「雅儒」。事實上，早在東漢，王充《論衡》效力篇即提出「文儒」這一概念。至明代，李贄完善並發展了這一概念。李贄將班固、劉向二人並稱「文儒」。然同為文儒，識見卻有高低之分：班固，文才甚美，以文取勝，卻缺經史聞見，更不具曠古隻眼；劉向，以筋骨、肝腸勝，識見高，儒而自文。³⁶言下之意，則是對文人的輕視。

儘管如此，明人仍將文人視作從儒分化出來的一種，亦即專事詩、文創作的詞章家。³⁷然文人不過是一通稱，而在明代典籍中，往往稱呼不一。陳萬益在《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一文中，已充分注意到這一問題。他說：

除了「山人」一詞之外，明朝末年，還有好幾個詞語相當流行，而又引起類似的名實之辨的問題：包括「文人」、「文士」、「才子」、「名士」、「高士」等。綜合來看，乃與晚明讀書人階層的形成有密切關係。³⁸

上述諸多名詞，或為文人的專稱，或與文人有密切的關係。至於「讀書人階層」云云，則為廣義的文人。事實上，明人對文人的稱謂亦不一。據明代典籍歸納之，大體可包括下列幾種：一是「文人」，亦有稱「詩人」者；二是「才子」，亦有稱「才人」、「才士」者；三是「文士」，亦有稱「韻士」者；四是「慧人」，亦有稱「慧業文人」或「慧男子」者；五是「詞客」，亦有稱「騷客」、「墨客」、「墨子」者。至於「名士」，或藉詩文而名，或藉講學而名，或藉談禪而名，其間不一，很難一概而論。而「高士」，則為隱士的代稱，與文士是同中有別。³⁹

³⁶ 李贄，《焚書》，卷5 賈誼（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201。

³⁷ 明人熊開元言：「有六經以來，即有詩，有詩以來，即不乏文人。」此即其例。說見氏著《魚山剩稿》，卷6 佛癡子韻音弁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清人別集叢刊》影印清刻本），頁517。

³⁸ 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見氏著，《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頁49。

³⁹ 明人袁中道言：「夫隱士文士，皆國家之鬚眉也。世貪功名如膏火，亦宜禮一二隱逸之士，以獎恬靜。」隱士、文士並稱。而謝肇淛則說：「文章與世運俱者也。故高士維世以身，文士維世以言。」高士、文士顯有區別。分見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1 南歸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82，據中央書店1936年版重印），頁70；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卷11 王百穀傳，集部第176冊，頁77。

三、文人群體的壯大

按照文學史的普遍觀念，明代的詩歌、散文的成就無法與唐代相比，甚至不及宋代。然就文人數而言，則明代遠遠超過唐、宋兩代。顯然，這是明代文學趨向下層民眾及通俗文學日漸發達的理想結果。在明代，不僅有傳統的詩、詞、散文的作者，而且出現了大量的戲曲、小說、民歌作者。從某種程度上說，文學已不再是士大夫或有錢人的專利，其讀者和創作者已擴大到下層知識分子或平民。明末清初學者黃宗羲的「文人」觀，無疑可以作為文人群體壯大的理論依據和總結。黃宗羲說道：

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⁴⁰

換言之，凡情真之語的創作者，均可視若文人，而並不以知識的有無、身分的貴賤，作為區分文人或非文人的標準。黃氏之言當然是明代文壇演進、文人趨多的實錄。文人群體的壯大，自然體現於來源於各色人群作品的增加。而明人好出文集風氣的形成，無疑就是最明顯的佐證。明人唐順之言：達官貴人或中科第人，死後「必有詩文刻集」。⁴¹ 錢謙益亦言：「近世翰林先生，人各有集。」⁴² 此顯為當時實錄。

究文集泛濫的原因，大體可以概括如下：首先，明人大多好名，一登仕途，不論其是否具有文學才能，無不刻一部詩文集，以為「不朽計」；⁴³ 其次，相較於前代而言，明代教育更為普及，識字人增多，尤其是大量生員的山人化，出現了一個山人階層；⁴⁴ 再次，商人出於牟利的目的，刻一些名家

40 黃宗羲，《黃梨洲詩文集·文集》，卷1 明文案上，第12冊，頁45。

41 唐順之，《唐荊川先生文集》，卷7 答王遵岩（上海：上海書店，1994，《叢書集成續編》影印《常州先哲遺書》本），集部第116冊，頁83。

42 錢謙益，《傳文恪公文集》，見潘景鄭輯校，《絳雲樓題跋》（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119。按：錢氏 徐仲光藏山稿 亦云：「今世達官貴人，例有集行世。」同書，頁155。

43 明季名僧株宏言：「世人將平生所作詩文，彙為一集，乞諸名士跋之，曰：以此為不朽計也。」堪稱當時實錄。說見氏著《竹窗三筆 不朽計》（臺北：臺灣印經處，1958），頁194。

44 關於明代山人，參見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頁37-83。至於晚明生員的山人化，可參見陳寶良，《晚明生員的棄巾之風及其山人化》，《史學集刊》，2000：2，頁34-39。

的集子，⁴⁵無疑亦助長了文集泛濫之風。

文集的泛濫，顯然是明代文人數劇增的一個側面反映。具體而言，上自君臨天下的皇帝，有御制文集的問世，諸如明太祖之《太祖御制文集》，明宣宗之《宣廟御制文集》；⁴⁶下至工「雕鏤之技」的名匠，亦有集子付梓；⁴⁷即使如太監、武將者流，其間亦不乏砥礪問學或好文之輩，作有詩文集，圖躋身文人之列。⁴⁸

方外、婦女在晚明文壇亦有一定的影響力，並在文集的刊行上留下了一定的印記。「詩僧」一稱，其源頗早。唐之杼山、禪月，在當時頗負盛名。晚明僧人，大多好外典，案頭多置儒書，⁴⁹或僧務外學，學詩、學文、學字、學尺牘。⁵⁰而一些著名的僧人，均有集子的刊刻，如憨山《夢遊集》，紫柏《紫柏尊者全集》。僧侶詩歌創作風氣的形成，必然會引起時人的注意，於是明選僧侶詩歌總集蔚然成風，舉凡萬曆時之《古今禪藻集》，崇禎時之《明僧弘秀集》，以及董濂之《明僧詩》，李鄴嗣之《古今高僧集》，⁵¹均可為例。

-
- 45 如王世貞之《弇州外集》，即出「賈人手」。見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卷1 弇州續稿序（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王時敏刻本），集部第7冊，頁47。
- 46 明人沈德符言：「本朝唯太祖皇帝、宣宗皇帝，禦制哀刻，尊藏禁中。」見氏著，《萬曆野獲編》，卷1 御制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上冊，頁3。按：仁宗亦曾有集，只是至明末，其集似僅存目而不復可見。參見陳寶良，《明代皇帝與明代文化》，《史學集刊》，1992：3，頁20-27。
- 47 如隆慶、萬曆間，嘉定雕鏤名匠朱小松，其詩作被歸莊評為有「白香山遺風」，詩稿曾由歸莊作序。見《歸莊集》，卷3 朱清甫先生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上冊，頁183-184。
- 48 明季，司禮監秉筆太監鄭之惠有志於左氏、太史公、班固之書。又作有詩集，曾請錢謙益為其作序。又名將如郭登、戚繼光、陳第、萬表，皆有詩名，並有集行世。即使如一般的武將，亦有集子，如姚福有《定軒集》。分見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33 鄭聖允詩集序，收入《傳世藏書》（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公司，1996），別集第11冊，頁182；又王士禎，《池北偶談》，卷17 儒將詩，《傳世藏書》雜記第2冊，頁151。
- 49 不妨試舉二例：一是石林上人，「喜獵外典，好苦吟」。一是眉照上人，「案頭多置儒家書，意有所得，輒形之於詩」。分見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21 寄巢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中冊，頁882；《歸莊集》，卷3 眉照上人詩序，上冊，頁197。
- 50 株宏，《竹窗三筆》 僧務外學，頁151-152。
- 51 相關資料及其論述，可分見：陳正宏、朱邦薇，《明詩總集編刊史略——明代篇（下）》，收於朱立元、裴高主編，《中西學術（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頁129-130；楊

按照歷代編詩歌總集的慣例，世家大族女子，間有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娼妓之前」，⁵² 故大家閨秀或宦族夫人，均以此為恥。儘管如此，在明代，婦女所作，淫詞麗語，觸目皆是。換言之，明代婦女能詩之人，代不乏人。尤其是到了晚明，小品文漸趨流行，山人更是到處可見。婦女亦漸為這種風氣所染，於是，晚明女子所作小札，多有小品氣象。最好的例子是杭城伎王瑣，嫻詩歌、尺牘，其所作尺牘，致妍韻冷，置諸晚明文人小品之林，毫不遜色。⁵³ 明季，常熟有柳如是，雲間有王修微，錢塘有李因，皆以「唱隨風雅聞於天下」，⁵⁴ 鼎足而三。又據鈔本《明事雜詠》云：「山人一派起嘉隆，未造紅裙慕此風，黃伴柳姬吳伴顧，宛然百穀與眉公。」注云：「黃媛介常在絳雲樓伴河東君，吳岩子常與橫波夫人遊，所謂女山人也。較之山人，尤風流可傳。」⁵⁵ 可見，當時的女山人、女清客者流，或以書畫，或以詩詞，均非幸致。

婦女對文學的主動參與，由此必然導致婦女文學的發達，這可以從晚明大量的女子詩總集中得到證明。明人纂輯女子詩總集的歷史，實可上溯到嘉靖時期，至萬曆、天啟時期達到極盛，流傳至今者有《詩女史》、《淑秀總集》、《彤管遺編》、《名媛璣囊》、《秦淮四美人詩四集》、《青樓韻語》、《古今名媛彙詩》、《古今青樓集選》、《花鏡雋聲》、《古今女詩選》、《閑情女肆》、《女中七才子蘭咳集》、《名媛詩歸》。⁵⁶

晚明大量布衣文人的出現，無疑對文人群體的壯大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所謂布衣文人，一方面是指晚明普遍存在的山人。換言之，在正德、嘉

松年，《中國文學評論史編寫問題論析——晚明至盛清詩論考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頁26；李鄴嗣，《臬堂續鈔》，卷1 甬上高僧詩序，見氏著，《臬堂詩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577-578。

52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1，頁1-3。

53 王瑣致程靜致小箋云：「昨日下午，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為冷人也。」寥寥幾筆，小品之性已具。說見鄭仲夔《耳新》，卷5 諧黠，收入《明史資料叢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第3輯，頁196。

54 黃宗羲，《黃梨洲詩文集·文集》，卷5 李因傳，第12冊，頁239。

55 轉引自謝興堯文，《堪隱齋隨筆》，頁241。

56 詳細闡述可參見陳正宏、朱邦薇，《明詩總集編刊史略——明代篇（下）》，《中西學術（二）》，頁124-129。

靖以前，廊廟尚數盈丘壑；隆慶、萬曆以後，韋布幾抗簪纓。⁵⁷ 另一方面，也是指那些從事民歌、戲曲創作的下層知識分子。在晚明，後一類文人決非少數。如青陽滾調戲曲，是明末清初繼弋陽腔以後，能與士大夫階層中流行的昆山腔抗衡的民間戲曲。據有的學者考察，青陽滾調的鼎盛時期，當在萬曆中到崇禎年間。而這些青陽滾調的輯者，既不是聲蜚文壇的名士，也極少涉足官場，多數是廁身民間、不見經傳的布衣之士。⁵⁸ 顯然，到了晚明時期，文人幾乎已構成了一個堅如磐石的集團，⁵⁹ 這一點尤應引起注意。

四、文人與文臣

眾所周知，晚明存在著一個以「究心風雅」為業的龐大群體，他們無疑是專業文人的基本群體，對文學的獨立發展和文學迅速走向下層社會有著相當大的影響。除了這些專業的文人以外，明代文人生涯事實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做秀才、舉子階段，所習者為八股文或科舉之學，以時文為敲門磚，獲取功名利祿；二是入仕以後，有了一定的政治、經濟地位，方從事古文、詩歌一類文學的創作，使文學與政治合一，文人與文臣一體。

從廣義的角度而言，文人等同於文臣，傳統史料亦並不刻意加以區分：

《太僕申節愍公傳》，華亭陳給事臥子作。嘗考甲申京師之變，文人殉難者二十有一人，其十九人死於官，一人以觀政進士未授官而死，一人以職事出巡，聞京師危急，赴難而死。⁶⁰

錢謙益亦說：「萬曆間文人，當推公為首。」⁶¹ 此所謂「公」者，指趙南星，為現任大僚。當西方人看待傳統中國這套官僚制度時，也往往將文人、文官合為一稱。如法國人阿蘭·佩雷菲特（Peyrefitte Alain）觀察清代官僚制度時，曾認為：「文官在中文裏的意思是『文人』。」⁶² 作如此理解，基本符

57 陳廣宏，晚明福建地區的城市詩人，《中西學術（二）》，頁140-155。

58 李平，樂府玉樹英殘卷對青陽滾調的探討價值，《中西學術（二）》，頁170-194。

59 Susan Naquin and Evelyn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6-58.

60 歸莊，《歸莊集》，卷4 書申節愍公傳後，上冊，頁297。

61 錢謙益，《初學集》，卷84 跋趙忠毅公文集，第11冊，頁457。

62 阿蘭·佩雷菲特著，王國卿、毛鳳支等譯，《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84。

合中國傳統文獻的意義。事實上，文官（即所謂的國家行政官員）也必須從文人中選出。⁶³

若細究之，文人與文臣顯有一定的區別。下面兩段記載頗能反映兩者的關係：一是「謝子曰：今之人謂文人必不習吏，而過之者又謂文人必習吏。」⁶⁴二是「夫窮曰文士，達曰文臣。」⁶⁵明人茅坤，多喜用「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或「縉紳學士」與「騷人墨子」、「騷人墨士」並稱，⁶⁶以前者代表文臣，以後者表示文人。至於文人、文臣之別，大體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其一，文臣是官，屬於官僚或縉紳階層，而純粹的文人則為民，屬於布衣之士，兩者之間的地位差別不言而喻。法國學者讓·德·米裡拜爾（Miribel, Jean de）曾給文人、文官作如下區別。他認為：「文人忠於亙古以來的老傳統，通常沒有封號。不在行政部門或學校擔任官職，終生攻讀或傳授知識。」⁶⁷而文官「是指掌管行政、督察的長官，有時也指掌管軍政的長官，但與專職軍事長官不同。」⁶⁸在明代，韋布與縉紳之間，確乎「勢分懸絕」。⁶⁹於是，在傳統中國，當家中有男孩出生的時候，幾乎每個父親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成為一個有學問的人，進入文人階層。⁷⁰

其二，在傳統中國，文人的社會地位，取決於他的門第與官位，並非他所構詩文的優劣高下。在明代，由於科舉制度盛行，門第基本不起太大作用，而是官位在決定文人的地位高下。正如王瑤所言：「一個作者無論他出身華素，到他成為文人時，他必須已經有了實際的官位，這政治地位實在就是他文人地位的重要決定因素。」⁷¹文人一旦通過科舉而獲得官位，即躋身

63 明人熊開元言：「古今之能其官者，率文人多耳。」此可為例。說見氏著，《魚山剩稿》，卷5 蔣明府古亭詩序，下冊，頁409。

64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卷4 李季宣詩卷，集部第175冊，頁660。

65 薛岡，《天爵堂文集筆餘》卷1，《明史研究論叢》第3輯，頁328。

66 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卷20 費處士墓阡記；卷32 何氏園林記題辭。均見《茅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628、881。

67 讓·德·米裡拜爾著，郭太初、張上賜等譯，《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關於陝西和西安府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30。

68 同上註，頁47。

69 薛岡，《天爵堂文集筆餘》卷2，《明史研究論叢》第3輯，頁337。

70 相關的記載，可參見麥高溫（Macgowan, J. de）著，朱濤、倪靜譯，《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北京：時事出版社，1998），頁47。

71 王瑤，政治社會情況與文士地位，《中古文人生活》，頁29。

文臣之列。且不說因做官而帶來的種種經濟利益，單就其榮耀和社會地位，也頗令人羨慕。文臣生有官位，甚至封公、侯、伯之爵，死後配享帝王廟庭，甚或從祀孔廟。⁷² 尤其是獲得各朝「文臣之首」美稱者，其榮譽更是無與倫比。而布衣有幸獲朝廷徵召，成為「徵士」，如陳遇、吳與弼、周文之流，畢竟屬於少數。⁷³ 大部分文人因科舉受挫，仕進無門，只好生活在社會的下層，憑藉其所掌握的知識維持生計。儘管如此，這些文人在他們自己的家鄉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的地位遠遠高於老百姓，甚至成為所在村鎮的領導人。⁷⁴ 對這些科舉受挫的下層文人，有學者給以足夠的重視，並進行了重新的評價，稱之為「讀書種子」，甚至稱其為「鄉曲之導師，地方之柱石，一方文家重鎮」。⁷⁵

其三，文人出仕，成為文臣，也即朝廷的命官，由此會帶來一些不便，甚或制約。一如明人海瑞所言：

士當斯世，既貧而無養矣。曰農、曰工、曰商，無非資身策也。此其事之在我者。一仕於人，則制於人。制於人則不得自由。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祿焉。⁷⁶

文人出仕，為了迎合帝王，維持自己的官位，難免會曲學阿世，於是文人轉而成為政客甚或以他的知識、文化去討取皇帝的歡心，為皇帝取樂，一如倡優無異。⁷⁷ 明代仁、宣兩朝形成的臺閣體，以及嘉靖朝的獻「青詞」之風，無不都是文人墮落的具體表現。而文臣詩格，則多以「避酸」、「迎福」為特點。所謂避酸，即其詩規模臺閣，避免流於瘦寒，以免與其進賢冠不副；所謂迎福，以為詩誠有識兆，如詩格豐肥華貴，則其官運亦為亨通。⁷⁸ 真正的文人或山林處士，因為不食朝廷俸祿，卻反而有更多的自由，在人格上也更

72 相關的例子，參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4、6、8 勳德文武、文臣封爵、文臣配享（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1冊，頁69、110、138。

73 王世貞，《弇州外集》，卷8 三布衣優禮，第1冊，頁144。按：凡有學行之士，經詔書徵召而不仕者，稱「徵士」，或尊之曰「徵君」。參見趙翼《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卷36 徵君、徵士，頁658。

74 同註70，頁48。

75 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59-60。

76 海瑞，《海瑞集》，下編 孟子為貧而仕議（北京：中華書局，1981），下冊，頁310。

77 周天，《文人的悲劇》，頁176。

78 倪元璐，《倪文貞集》，卷7 王瞻門比部詩序（《四庫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84。

具獨立性。正如明人呂坤所言：「山林處士，常養一個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⁷⁹此即一證。

毋庸諱言，文人需要依附王室、官僚，以維持生計，於是就有了晚明山人的流行。換言之，山人無疑具有庸俗的一面。關於此，明代史料揭示道：

今天下多文人矣。身在草莽，而通姓名於大人先生，且朝作一文，暮鑄於梓，往往成巨帙，干謁貴人及結納知名之士，則挾以為贄，如此，文雖佳，俗矣。⁸⁰

不過，山人在依附大人先生的過程中，亦儘可能保持自己的人格。正如明人薛岡所言，「在上必凌，在下必援，上交必諂，下交必瀆」。⁸¹這原本是交道的必然。但若縉紳有慕於韋布，何妨先施折節？道理很簡單，如果渴慕布衣，雖「介人道意，致詞極其諄懇，然必不肯辱而臨之，而必望士之先造，此所以士之必不往也」。⁸²尤堪注意者，晚明山人並不以「趾翔人間」為恥，而是極為其辯護。下面這段記載頗能說明問題：

鄒山人，隱者也，沈耀滅響，不與世聞，宜矣，而趾翔人間，或者病之。鄒山人曰：「嗟乎！世無鼓刀之叟，則朝歌之肆皆屠沽矣。後世其謂予何！天有五氣，中人腴理，其體必隨氣而病。來遊人間者，皆中其氣而病者也。豈獨予乎哉！上者以得時行道中，次以功名中，次以干祿中。孰謂非遊人間者！夫隱者，至寂者也。寂而無聞，勢必汨沒，後世豈誰知之？嚴君平、郭林宗，非予之徒耶？故予遊於縉紳先生間，其病亦以此。」⁸³

山人遊於縉紳先生間，往往被時人所批評，而鄒山人卻公開為其辯護，這說明晚明山人群體壯大，已是時勢所趨。其實，明代布衣詩人，多有名聞遐邇者，並為縉紳先生所尊重。如孫一元、謝榛、宋登春三人，均布衣以詩名。⁸⁴尤其是王婁登、陳繼儒兩位山人，更是在明末名噪一時。如王婁登，不過一

79 呂坤，《呻吟語》，卷4 品藻（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影印明萬曆刻本），頁551。

80 歸莊，《歸莊集》，卷3 嚴祺先文集序，上冊，頁216。關於明代山人之習，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一文有詳細闡述，《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頁42-53。

81 薛岡，《天爵堂文集筆餘》，卷2，《明史研究論叢》第3輯，頁337。

82 同上註。

83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2 送鄒山人序，見《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第2冊，頁416。

84 董復亨，《繁露園集》，卷8 重刻太白山人漫稿序（《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41年張銓刻本），集部第174冊，頁215。

措大，然自王公貴人、章甫逢掖，以至緇衣黃冠、倡優儷隸，無不以一見婁登或得婁登片言品題為榮。王氏堪稱明代以布衣操袞鉞之權第一人。⁸⁵

五、文人與學士

傳統中國文人，除出世、入世這一對矛盾外，還有與此相關的經世文章與雕蟲之技之爭。⁸⁶ 爭論的起因，實乃東漢末分設 儒林 與 文苑 。此舉原本有利於文人的獨立及地位的提高。然饒有興味的是，自宋代道學大盛以後，文人地位反一落千丈，而講道之儒生卻以傳統知識傳授者的正宗自居。與此相應，文人因其品行死後不得入鄉賢祠，⁸⁷ 或者不得入 儒林傳 ，只能入 文苑傳 。⁸⁸ 這樣，在儒林、文苑之間，頓具高下之別。

儒林、文苑之士爭論的焦點，在於如何看待文學創作。儒林人士認為，文章應如布帛粟菽，不僅應「載道」，而且須具有實用性，不應成為玩物喪志之事。而文苑人士則認為，文學乃「言志」之器，應該抒發自己的真實感情，亦即所謂的「獨抒性靈」。如明人王廷相說：

文以闡道，道闡而文實，《六經》所載皆然也。今之言者曰華而無文。嗟乎！夫人有蹈道之言，有見道之言，安論性行一軌？言而不欲合道傳志，將何為邪？故知文士之言靡而寡用。⁸⁹

可見，傳統的鄙薄文人、輕視文學，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尤其自宋以後，道學興盛，更是視文學為一無用之物。換言之，自宋以後，儒之分化更為明顯，在道德之儒與文士之間幾成一鴻溝。正如明人何良俊所言：「今世談理性者，恥言文辭；工文辭者，厭談理性。」⁹⁰

85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卷11 王百穀傳，集部第176冊，頁76-77。

86 陳平原，知識者介入社會的特殊途徑，見氏著，《書生意氣》（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6），頁165。

87 如明人李昌祺曾作有小說《剪燈餘話》，被人視為「文人」，而不得入祀鄉賢。此即其例。說見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33，引《野記》，中冊，頁557-558。

88 平步青，《霞外攬屑》，卷4 毛西河（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98。

89 王廷相，《雅述》上篇，《王廷相集》第3冊，頁843。

90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4 經 4（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30。

關於宋儒輕視文學，可引明代文人文徵明之言，以作更進一步的論。文氏言：

夫自朱氏之學行世，學者動以根本之論，劫持士習。謂六經之外，非復有益，一涉詞章，便為道病。言之者自以為是，而聽之者不敢以為非。雖當時名世之士，亦自疑其所學非出於正，而有「悔卻從前業小詩」之語。沿訛踵敝，至於今，漸不可革。嗚呼，其亦甚矣！說者往往歸咎朱氏，而不知朱氏未始不言詩也。⁹¹

當然，文氏是替朱熹辯解。然若認真考察起來，宋儒確乎輕視文學和文人，朱熹也不例外。如《朱子語類》卷 140 云：「今江西學者有兩種。子靜門猶有所謂學。不知窮年窮月做得那詩，要作何用。」又卷 140 論趙昌父云：「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⁹² 如此等等，餘不贅舉。即使程頤，其輕視文學的態度與朱熹幾乎一致：「做得文章好，便是不幸。」⁹³ 此言雖因東坡而發，不過對文學所持的不讚賞態度，亦不言而喻。於是，一些儒者語錄，往往多率然之語，意是而詞有病，其結果同樣是使後人讀之誤認害事。換言之，道學家通過輕視文學的高傲態度，以掩飾其不善文詞的短處。

文人地位的低落，也不可全怪道學家，其實文人自己也應承擔部分的責任。文人從一開始就對自己的文學缺乏信心，反而抱有一種自卑心理。譬如十足的文人揚雄在《法言》裏就說：「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可見，他甯做壯丁，不做文人。有「詩聖」之稱的杜甫，對於文學，也似乎全然缺乏信仰和愛敬。他說：「文章一小道，於技未為尊。」⁹⁴

一至明代，儒學之士仍然瞧不起文人，繼續前代「一命文人，便無足觀」之說，甚至文人也有不以文人為榮的例子。不妨試舉下面四例，以示這種看法的廣泛性：一是如號稱明初「文臣之首」（也是著名的文人）的宋濂，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又艷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

91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 17 晦庵詩話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上冊，頁 469。

92 轉引自錢鍾書，《談藝錄》，頁 404。錢氏對此有極好的梳理，可資參看。

93 馮班，《家戒》，轉引自向燕南、張越編注《勸孝俗約》（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 302。

94 揚雄、杜甫之說，可分見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頁 78；又黃淳耀，《陶庵全集》，卷 22 陶庵自監錄四（《四庫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867。

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⁹⁵ 二是楊士奇也號稱仁、宣朝的「文臣之首」，卻對儒亦作了高下之分：「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⁹⁶ 三是純粹的講學家薛應旂，公然認為詩與文，不過是「士之餘事，而君子不屑於用心者也。」⁹⁷ 四是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不是講學家，屬正宗的儒家學者，而且在文學上也有較高的造詣，卻對文人也表露出不屑一顧的姿態：「《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⁹⁸ 儘管上述輕視文人的看法在明代儒學人士中相當普遍，而且滲透到文人層中，然自明代中期以後，確乎有一些文人以自己身為文人自豪。如錢貴，出仕以後，與道學名流應元忠、鄒謙之遊，治心養性，謝去一切支離文字，儼然以道學家自命，每勸文徵明「文藝喪志」，希望文氏亦能學道。然文氏卻笑曰：「人有能有不能，各從其志可也。」⁹⁹ 而湯顯祖更不以文人為恥。有人勸他去講道，但他卻寧可講情。¹⁰⁰ 他認為：「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靈性。能為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無名能為者。」¹⁰¹ 做一名文人如此之難，顯示出文人地位漸高。由上可知，晚明文人已真正從儒階層中分離出來，成為一股全新的社會力量。

文人的地位在人們的觀念中一旦穩固，就會形成自己獨特的特點，無論是生活，還是行為。與傳統的道學家相比，明代文人基本具有下列特點：

其一，儘管在文人中，按其詩風的不同，尚可分為文人之詩與詩人之

95 宋濂，白牛生傳，見杜聯陞輯《明人自傳文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頁92。而在自題畫像贊中，宋濂也不願自己「局乎文藝」，或溺於「浮華之麗」，而是其心與天地或聖賢同。見同書，頁93。

96 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46，引《三朝聖諭錄》，中冊，頁1083。

97 洪朝選，《洪芳洲先生摘稿》，卷1 方山詩錄序，見《洪芳洲公集》（臺北：洪福增重印本，1989），上卷，頁18a。

98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3 與人書十八，見《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96。

99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30 明故鴻臚寺寺丞致仕錢君墓誌銘，上冊，頁707。

100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8，頁226-227。

101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32 張元長嘯雲軒文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下冊，頁1078。

詩，然差別並不很大。¹⁰² 若將文人之詩與學者之詩進行比較，則其風格差異較為明顯。先可引錢謙益之說以作說明，錢氏言：

余惟世之論詩者，知有詩人之詩，而不知有儒者之詩。《詩》三百篇，曰雅，曰頌，言王政而美盛德者，莫不肇制典謨，本於經術。炎漢以降，韋孟之諷諫，束廣微之補之，皆所謂儒者之詩也。唐之詩人，皆精於經學，韓之元和聖德，柳之平淮夷雅，雅之正也。玉川子之月蝕，雅之變也。¹⁰³

錢謙益肯定有「詩人之詩」與「儒者之詩」的區別，並認為儒者之詩本於經學，卻並沒有指出詩人之詩的特點。為示明晰，可再引李顥之說：

詩於士雖非急務，要亦在所不廢也。然有學者之詩，有詩人之詩：養深蓄厚，發於自然，吟詠性情而無累乎性情，此學者之詩也；雕句琢字，篇章自工，疲精役慮，而反有累乎性情，此詩人之詩也。¹⁰⁴

可見，學者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區別，則在於一學有涵養，發於自然；一學無根植，雕句琢字。

上述區分，僅僅是舊式學者的簡單劃分，而且帶有部分的片面性。事實上，文人指詩人、散文作者、小說家、戲曲家；而學者即學士，包括經生、學究、注家甚至道學家。按照錢鍾書的說法，在文藝鑒賞方面，「文人慧悟逾於學士窮研」，「詞人體察之精，蓋先於學士多多許」。¹⁰⁵ 換言之，文人感覺敏銳，富有靈感，表現與表達力強，能豐富文字；而學究、經生只會皓首窮經，以考據代替文學的鑒賞領悟，對文學的本質與特性多不通曉。而以講學為職責的道學家之流，其對文學缺乏真正領悟，實與學究同病。

事實確乎如此。在明代，文人多被人稱為「慧男子」，而且有「風人之致」。¹⁰⁶ 按明季文人袁中道的說法，「凡慧則流，流極則趣焉。天下之趣，未

102 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區別，可以錢謙益與程嘉燧、馮班作一比較。據清人王應奎考察，文人之詩，多雄厚博大；而詩人之詩，有神韻，並具細膩的特點，卻才氣頗小，筆亦未甚爽健。可具一說。見王應奎，《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頁19。

103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19 顧麟士詩集，中冊，頁823。

104 李顥，《二曲集》，卷19 三冬紀遊弁言，頁225。

105 孔慶茂，《錢鍾書與楊絳》（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7），頁262-263。按：錢鍾書之說，明人薛岡已開風氣之先。薛岡言：「風人與訓詁人，肝腸意見絕不相同。訓詁者往往取風人妙意，牽強附會，老杜身後受虞、趙二君之累不淺。」見薛岡，《天爵堂文集筆餘》，卷1，頁330。

106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20 李繼仲詩序，中冊，頁838-839。

有不自慧生焉。」¹⁰⁷而這種風人之致，正好是學者或道學之流所缺乏的。正如湯顯祖所言：「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甯復有文章乎？」¹⁰⁸

其二，文人與道學家流的人格特徵迥然有別。明代知識階層，終身處於利害毀譽之途，無法解脫，誠有莊子所謂一月之間開口而笑者，不能數日。大體說來，「纔謝乳哺，入家塾，即受蒙師約束；長而為民，則官法束之；為士，則學政束之；為官，則朝議束之。」¹⁰⁹這種嚴肅、乏味的生活，尤以道學家為甚。道學之士，大多為人拘謹，甚或迂腐，從而與風流生活無緣。明人以「偽」、「腐」二字概括講學家之病：「偽者，行不顧言。腐者，學不適用。」¹¹⁰至於講學者平時的儀態，也是「多規行矩步，瞑目拱手示深遠」，¹¹¹完全是一副行若土偶或道貌岸然的樣子。

而文人則可以放言高論，毫無顧忌，行為放蕩不羈，甚至不乏狎妓者。明人何良俊曾對文人生活的文采風流作如下標準劃分：一是善書畫，自己亦能塗抹幾筆；二是喜歌曲，教粧戲子數人；三是室中蓄侍姬三四人。¹¹²晚明文人行為則可以概括為：一是狂傲。如明代中期文士桑悅、祝允明，肆口橫議，略無忌憚。桑悅對丘濬言：「舉天下文章，惟悅，其次祝允明」。¹¹³允明作《罪知錄》，亦力詆韓、歐、蘇、曾六家之文。¹¹⁴又何景明，傲視一世。在京師時，每有宴會，常閉目獨坐，「不與同人交一言」。有一日，甚至「命隸人攜圓桶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圓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去。」¹¹⁵二是言語輕薄，互起譚名、綽號。如陳石亭有「陳木匠」之號，鄺某喚做「鄺響

107 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3 劉玄度集句詩序，頁40。

108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32 合奇序，下冊，頁1078。

109 江盈科，《雪濤閣集》，卷8 笑林引，見《江盈科集》上冊，頁438。

110 呂坤，《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5 楊晉庵文集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33年呂慎多刻本），集部第161冊，頁155。

111 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卷8 參議惠鹿吳公墓誌銘（《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王時敏刻本），集部第7冊，頁198。

112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17 史 13，頁150。

113 王士禎，《香祖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1，頁19。

114 同上註。

115 同註112，卷15 史 11，頁126。

馬」，馬西玄因文弱可愛，狀若處女，故有「馬二姐」之號。¹¹⁶ 三是狎妓。余懷曾有為文士「狹邪之遊」辯解之言：「狹邪之遊，君子所戒。然謝安石東山攜妓，白香山眷戀溫柔，一則稱江左風流，一則稱廣大教主。因偶適其情性，亦何害為君子者？」¹¹⁷ 如康海，其所娶尚夫人甚賢，但康海每日「遊處狹斜中，與夫人大不相洽，後遣之歸」。¹¹⁸

明代文人與道學家之別，可詳引下面一段記載，以資說明：

崇禎初，余中丞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公造次必以禮法，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思試之妓。顧氏（指顧媚）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鵬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室。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為聖成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¹¹⁹

面對絕色豔妓，無論如何親昵、挑逗，卻不為所動，只是一句「無庸」，這是何等的氣概。可見，真正的道學者之流，他們崇尚的人格是如聖人、佛一般的至善。換言之，他們力學的目的，是死後從祀孔廟，吃「冷豬肉」。而對文人來說，卻可以不拘細行，放浪形骸，動輒稱「豈有生肉與我吃哉」！¹²⁰

其三，自明代中期以後，尤其到了晚明，文人與道學之士的界限也漸漸模糊。道學家生活趨於活躍，「心學」一派功不可沒。明代心學先驅陳獻章對文人就抱不加輕視的態度。他說：「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¹²¹ 故陳氏的生活，相當「活潑潑」，有山水之樂，飲酒之樂，詩酒風流，一如文人無異。¹²² 又如王陽明，道德、事功、文章聚於一身。黃宗羲稱

116 同註 112，卷 18 雜記，頁 155。

117 余懷，《板橋雜記 後跋》，見王文濡編，《香豔叢書（精選本）》（長沙：嶽麓書社，1994），頁 54。

118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 15 史 11，頁 128。

119 顧公燮，《丹午筆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第 150 則 余中丞以妓試黃石齋事，頁 138。

120 駱文盛，《駱兩溪集》，卷 13 南楚雜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 41 年張時震刻《合刻武康四先生集》本），集部第 100 冊，頁 689。

121 陳獻章，《陳獻章集》，卷 2 與王樂用僉憲（北京：中華書局，1987），上冊，頁 154-155。

122 如陳獻章有詩云：「一曲一杯在下醉，人生能得幾回逢？」幾無絲毫頭巾氣。同上註，卷 6 對菊，下冊，頁 571。

頌王陽明雖不欲以文人自命，卻「深於為文」。¹²³ 晚明文人生活的活躍，實得力於陳、王二人。

即使治學傾向於程朱的學者，亦受時風所染，在個人生活上同樣變得很豐富多采。譬如，趙南星身為東林黨魁，人但見門庭高峻，不可梯接，而未知他也通俠縱酒，風流倜儻。他有一封尺牘，提到「菊子」、「翠柳」、「黃二姐」，均為當時樂妓。¹²⁴ 另一東林黨魁顧憲成，號稱道學宗主，立朝大節嶽嶽，然其鄉里人，「每言其有桑中之事」。¹²⁵ 如此等等，均可為例。

六、文人與武士

文武異途，自古已然。殷周以來，「文」、「武」就代表著兩種概念。「武」字表示人的一種事功（征伐），偏於政治的意義；「文」字表示人的一種行為態度，偏於倫理的意義。文人與武士自然是不同的兩種人。¹²⁶ 換言之，文人乃溫文爾雅的斯文之士，而武士則為豪爽粗魯之輩。在文人看來，武人口吻，甚是可笑。如張獻忠尊梓潼神為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曰：「你姓張，咱羅子也姓張，咱與你今日連了宗罷。」¹²⁷ 此即一例。

與此同時，文武合一，或文武備於一人，又是自古以來的理想人格。《左傳》中楚莊王所謂「止戈為武」的說法，其「武」字真諦或精神，旨在寢兵息民，反而帶有一些「文」的內涵。¹²⁸ 又如明人李贄認為，古代男子出行，不離佩劍，遠行不離弓矢，平日不離佩玉。佩玉名為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豫防，文武兼設」。¹²⁹

就文武關係而言，古代文、武合一，故伊尹、周公、管仲、樂毅之流，

123 黃宗羲，*臬堂文鈔序*，刊李鄴嗣《臬堂文鈔》卷首，見李鄴嗣，《臬唐詩文集》，頁379-380。

124 鄧之誠，《骨董續記》，卷1 趙忠毅尺牘（北京：中國書店，1991），頁309。

125 歸莊，《歸莊集》，卷10 隨筆二十四則，頁518。

126 季鎮淮，「文」義探原，《來之文錄》，頁24。

127 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3 武人口吻（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頁199。

128 詳細參見張高評，《左傳之武略》（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6-7。

129 李贄，《焚書》，卷5 無所不佩，頁217。

入作卿士，出為元帥。自漢以後，文武漸分。文人以談兵為恥，而將武事委之粗人武士。儘管如此，當時猶有虞詡、諸葛亮、周瑜、杜預、謝玄、李靖、裴行儉、韓琦、李綱之徒，奮策儒素，建功闔外，為時宗臣。

一至明代，明太祖以馬上得天下，而崇儒重道，思得文武兼資之士。英宗、景帝之時，有王驥、于謙；憲宗、孝宗時，有韓雍、王越；武宗、世宗時，有王陽明、楊一清，皆起家書生。但就其大概而言，明初重武之風頗盛，武臣權力，相對比文臣要大。如明初，天下府僚全由衛官節制。朔望，郡官至衛作揖，「生徒、里老亦先詣聽處分」。¹³⁰ 每當有大征伐，即有武臣丈鉞而出。其後因武臣不可專任，而添設總督、巡撫，似乎是用文將，然佩印者實為總兵官，而調度則聽命於督、撫。¹³¹ 右文日久，儒吏掌管征伐之事，於是視大帥如僕隸。尤其到了晚明，武臣體貌日輕。武臣自總兵以下，即為副將和參將，原本可與司道並列。但在晚明，卻有巡按御史鞭朴副總兵，巡撫捆打參將之例。¹³² 即使如戚繼光、李成梁這樣位三孤、封五等的名將，見了權臣張居正，也只能自稱「門下沐恩小的某萬叩頭跪稟」。¹³³ 國家無事時，文、武互相譏諷；有事時，則互相傾軋。「文人謂武人不足語，武人又謂文人無用，不識時務。」¹³⁴

從仕途的角度而言，對明代的文、武關係大體可以概括如下：明初文武合一，甚或重武輕文；明代中期以後，文武異途，甚或重文輕武。自正德、嘉靖以後，出現了一種「儒將」的說法。「將」而又「儒」，並非是「文武全才」的典型，而是武將拋棄自己的習武本業，去附和文士的習氣。與此相應，巡撫、巡按也以文字的優劣作為薦揚武將的標準，兵部也據此作為任用的尺度。而晚明文、武關係的實際演進過程，卻是文人尚武精神的形成，進而投筆從戎。這一風氣由丘濬開其端，倡導「文武一道」，繼之者有唐順之、趙本學、鄭若曾、陳第、茅元儀、曹飛、陸世儀等，從而形成一股「尚武」

130 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33，引《野記》3，上冊，頁555。

131 陳子龍，《陳子龍集》，卷10 儲將才，見《傳世藏書 集庫 別集》，第10冊，頁86。

132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9 按臣笞副總兵，中冊，頁495-496。

133 同上註，卷17 武臣自稱，中冊，頁452。

134 魏季瑞，《魏伯子文集》，卷1 閩將軍壽序（《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道光25年寧都謝庭綬絳園書塾重刻本），集部第4冊，頁27。

與「重兵」的風尚。¹³⁵ 武將則重文輕武，追求文人的風雅生活，寬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甚至邊庭帥府也成為山人清客會聚的地方。文與武以另一種形式發生了緊密的聯繫。

傳統文人大多胸懷大志，然一旦科場失意或干謁不成，就只好投身邊塞戎幕，以為晉身之階。明代文人也不例外。如嘉靖年間，倖臣胡宗憲、趙文華輩，開府浙江。時世宗方喜祥瑞，爭以表疏稱賀博寵，詞人紛紛入幕，諸如胡宗憲幕府之徐渭、沈明臣、趙得松、朱察卿。¹³⁶ 文、武失其本色，是晚明的基本特點。對文人來說，時勢動蕩，正是他們大顯身手的時機，於是紛紛「抵掌而譚孫吳，恨不得一當單于，以暴其能於天下。」¹³⁷ 更有一些文人，效班超投筆故事，毅然棄去文章之事，以武胄起家，成為將軍。如何南吉，死後被茅坤稱為「誰言將家子，恥做一文儒」。¹³⁸ 至於陳第，更是投筆從戎的著名文人和學者，其例在此不贅。

與此相應，一些武將也以習文為雅事。武人能詩，自古以來，不乏其例。明代武將能詩者，有沐昂、俞大猷、郭登、李言恭、萬表、陳第等，其詩「皆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¹³⁹ 並非只是能寫「明月赤團團」一類俗句。尤其是戚繼光，因深得文壇名人汪道昆、王世貞的稱道，儼然以風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輩，尊之為「元敬詞宗先生」，幾與縉紳分道揚鑣。又蕭如薰，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輩紛紛投入幕中，尊稱其為「季馨詞宗先生」。¹⁴⁰ 其他如杜弢武，亦甚好文，建曲館，以「經文緯武」顏其齋，作有《餐霞外編》。¹⁴¹ 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概括言之，文人好武，喜談兵，武士好文，喜優雅，這是晚明的風氣。究其實，文人好武，多紙上談兵而已，不切實際；而武士習文，亦非其本色

135 關於晚明的「尚武」精神，可參見陳寶良，〈晚明的尚武精神〉，中國明史學會主編，《明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1991），第1輯，頁248-259。

136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7 武臣好文，中冊，頁434。

137 葉春及，《石洞集》，卷13 廷珪中將軍之長樂序（《四庫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664。

138 茅坤，《白華樓吟稿》，卷4 吊南吉何都閩詩，見前揭《茅坤集》，上冊，頁39。

139 王士禎，《池北偶談》，卷17 儒將詩，頁224。

140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7 武臣好文，中冊，頁151。

141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卷5 餐霞外編，集部第175冊，頁674。

當行。對內憂外患的晚明時代來說，這種文恬武嬉，決非一件幸事，卻是當時風氣的實錄。

七、文人特性舉隅

到了晚明，由於龐大的山人或布衣文人層的存在，使文人具有較多的獨立性。尤堪注意者，晚明士人主體意識的高漲，士人生活的漸趨活躍，文化的多姿多彩，無不與這些純粹的文人有關，而與儒家學者或道學家之流無涉。明代文人當然具有歷代文人的共性，卻又獨具個性。簡言之，明代文人的特性可概括如下：

一是「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至明代尤甚。這固然一方面是中國傳統的「面子」問題所致，另一方面也與明人好名之習相關，更進一步說，自明代中期以後，士人主體意識的高漲，對「文人相輕」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文人相輕，確乎自古已然。清人趙翼輯《文人相輕》一則，於文人相輕陋習多所鉤勒。據此可知，貴遠賤近或尊古卑今，這是世情所不免。甚至有彼此傾軋者。如揚雄作《法言》，張伯松不肯觀；班固、樂毅，文在伯仲之間，而固嗤毅；魏收與邢邵俱以才名，互相訾毀；¹⁴² 薛能小有才，而妄自稱詡，其論詩有「李白終無取」之句；杜牧著論，稱元白「淫言媿語」，極盡醜詆之能事。¹⁴³

明代文人相輕，其例更多，其事更甚，或至於可笑。譬如，劉子威好為聲牙詰屈之文，為吳人所推服。卜士袁景休，卻時常向人抉摘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並加以嘲笑。子威聞之大怒，訴於邑尉，攝而笞之。尉數之曰：「若復敢姍笑劉侍御文章乎？」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十，終不敢改口沓舌，妄諛劉侍御也。」¹⁴⁴ 彭堯論，工為詩，遊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談不合，「奮拳毆之」；如皋冒伯麟，文出於後七子，時人攻擊七子甚力，伯麟守師說，「憤楚人之訾警，至欲以身死之」。¹⁴⁵ 而歸莊《難壬》一篇，列舉

¹⁴² 趙翼，《陔餘叢考》，卷40，頁728-729。

¹⁴³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18《文人勿相輕》，見《傳世藏書·子庫·文史筆記》（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第2冊，頁181。

¹⁴⁴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3，頁72。

¹⁴⁵ 同上註，卷4，頁119-120。

甲、乙、丙、丁、戊五位以文章著稱於時的文人，以及壬這位「粗有文筆」的無行小人。通過壬在甲、乙、丙、丁、戊之間的種種挑撥，以揭露文人相輕之習。¹⁴⁶ 這種文人相輕習氣，甚至滲透到講學家之流。如朱熹因蜀、洛之故，對蘇軾極盡醜詆之能事，稱蘇軾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其徒秦觀等「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¹⁴⁷ 明代講學，亦頗多意氣之爭，不為明道，只為角勝，「字面詞語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¹⁴⁸ 顯然，也是文人相輕習氣在作祟。

明代文人相輕，究其原因，則是明人好名所致。正如明代思想家陳獻章所言：「古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乎名之不著。」¹⁴⁹ 呂坤也有相同看法：「今人苦不肯謙，只要拏得架子定，以為存體。」¹⁵⁰ 確乎一語道破天機。從較深的文化層面來看，則是「面子」二字在作怪。面子包含了下面兩層意思：第一層是榮譽或聲望，第二層是自尊和尊嚴。¹⁵¹ 為了避免使自己蒙羞，就要全力維護自己的面子，無論是對或錯，於是就產生了文人相輕現象。而對這種現象，當作如何評價，則確乎見仁見智的事。貶之者將其稱為「文壇無賴的不傳之秘」。¹⁵² 而平和者則認為，文人好名，爭風吃醋，歷來傳作笑柄，「只要它不發展為無情、無義、無恥的傾軋和陷害，終還算得『人間喜劇』裏一個情景輕鬆的場面」。¹⁵³ 在傳統統治者看來，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與，故其患小也」。¹⁵⁴ 然若與晚明士人個性張揚、主體意識日高的時代大背景結合來看，這種文人相輕現象，何嘗不是一種具有時代意義的新氣象。換言之，正因為文人自信，方養成自傲，甚至互相輕視。不僅自信，明代文人並非一味掩飾自己短處，而是繼自信之後，

146 歸莊，《歸莊集》，卷10，下冊，頁503-504。

147 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3 詆毀東坡，頁169。

148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5，頁137。

149 陳獻章，《陳獻章集》，卷3 與林蒙庵，上冊，頁242。

150 呂坤，《呻吟語》，卷2 修身類，頁289。

151 對中國文化中的面子問題，英國人麥高溫堪稱最早的研究者。作者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年，對此有較深刻的認識。見麥高溫著、朱濤、倪靜譯，《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頁333-334。

152 陳四益，《牛山四十屁》，見氏著，《亂翻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37。

153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轉引自黃裳，《妝臺雜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129。

15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集部總敘》，轉引自季鎮淮，《來之文錄》，頁95-96。

能及時自悔。正如譚元春所言：「予因思古今真文人何處不自信，亦何嘗不自悔？當眾波同瀉，萬家一習之時，而我獨有所見，雖雄才辯口，搖之不能奪其信。至於眾為我轉，我更覺進。舉世方竟寫喧傳，而真文人靈機自檢，已遁之悔中矣：此不可與鈍根浮器人言也。」¹⁵⁵ 譚氏隨後詳舉袁宏道為例，茲不具引。

二是文人輕薄、無行，自古已然，至明更甚。李志慧對唐代文人曾作過深入的研究，並就唐代與明代文人作了如下區別：「唐代文人在政治上、事業上和文學上的積極追求，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上升時期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是唐代文人區別於明清時期那些政治上沒有出路的風流才子和鄉村學究的一個重要標誌。」¹⁵⁶ 可見，明代文人表現為兩種類型，即風流才子和鄉村學究。而風流才子則是文人輕薄、無行的最好佐證。

明代文人輕薄，當起於明代中期的吳中諸才子。成化、弘治末，吳中才子唐寅、祝允明，先後負雋聲，饒豔藻。唐氏著有《金粉福地賦》，甚豔麗。祝氏先有《煙花洞天賦》，正堪與唐賦作對。其後，祝氏又作《風流遁賦》，均為俳語。詞雖淫媠，亦自有致。究其原因，唐、祝二人均為老公車，不得志，「寄迹平康以銷壯心，即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¹⁵⁷ 詞雖豔麗、輕佻，人卻不能說無行。

一般認為，「文學士多寡節氣」。究其原因，據明人吳廷翰的解釋，則是：「以其習華悅人，故性成而柔馴，居嘗議論罪罪有餘，及臨事難，輒蓄縮巽奕，戰漢不能出一語，往往殞其守。」¹⁵⁸ 與道學之士相比，文人的氣節確乎稍有不和。不妨舉明末文人董其昌、錢謙益，與道學家劉宗周、黃道周作一比較。董其昌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如山斗。然受名士流風影響，「每疏繩檢，且以身修為庭訓，致其子弟亦鮮克由禮」。¹⁵⁹ 後董其昌在鄉為富不仁，終於引起民眾的憤慨，有「民抄董宦」一事。錢謙益為明季文壇領袖，卻不惜行檢，當原配陳夫人還在時，即以河東君柳如是為妻，「以妾

155 譚元春，《袁中郎先生續集序》，見氏著，《鵝灣文草》，頁45-46。

156 李志慧，《唐代文苑風尚》，頁5。

157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4，下冊，頁904-905。

158 吳廷翰，《文集》，卷上《郡貳包白崖先生擢成都別駕序》，見氏著，《吳廷翰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65。

159 毛祥麟，《對山餘墨》黑白傳，見《香艷叢書（精選本）》，頁614。

為妻」，其無行可見一斑。¹⁶⁰ 錢氏一事，若屬實，正堪稱無恥之尤了。據明末清初人李清載，謙益降北以後，柳如是留南京，與一私夫亂。謙益子鳴其私夫於官，杖殺之。謙益怒，屏其子不見，語人曰：「當此之時，士大夫尚不能堅節義，況一女人乎？」聞者莫不掩口。¹⁶¹ 錢氏在家鄉的口碑亦不佳。反觀道學之士，在大是大非的緊要關頭，卻能盡節而死，終成綱常人物。如劉宗周、黃道周，在崇禎年間被視為「天下清望」。當浙中不守時，宗周不食而死；道周受閩中之命，以閩部督師，被擒死之。¹⁶²

三是文人窮酸，而且願意言窮，甚至哭窮。輕薄、無行，出入花街柳巷，這是風流才子的勾當。而絕大部分的下層文人，即所謂的鄉下學究，則無不是一副窮酸樣。明朝人早就認識到文人與窮的不解之緣。如袁中道就說：「知交中韻士，即是貧士。富人多非韻人。」¹⁶³ 但明代文人更喜言窮。如江盈科有詩雲：「作吏經三載，殘軀萬苦餘。子錢增是母，宦橐薄於儒。乞米憐腰慣，窺銅笑貌臞。鄉書不敢寄，猿鶴恐嘲予。」¹⁶⁴ 此即其例。

當然，窮酸只是與學究為伍，而與那些已有官位的大人先生無緣，如江盈科之言窮，只是一種文人習氣在作怪，其實與鄉村學究相比，他的日子並不難過。正如近人朱自清所說，向來說「寒酸」、「窮酸」，似乎酸氣者聚集在失意的書生身上。得意之後，見多識廣，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那時就不會執著在書上，「酸氣味」是可以洗掉的。¹⁶⁵ 事實確乎如此。明代出仕過的文人，無論其如何說窮，終有基本的田地、房產供其消費。如唐順之，初時有田百畝，其後增至「盈千」。¹⁶⁶ 又如袁中道，自言維持其逍遙的文士生活以及養家的經濟來源：有供粥之田，可取租四百餘石；歲有租銀近百金；又在沙市有一宅，售值可置田數百畝。¹⁶⁷

160 王應奎，《柳南隨筆》，卷1，頁2-3。

161 李清，《三垣筆記》，中 崇禎（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85。

162 歸莊《歸莊集》，卷10 隨筆二十四則，下冊，頁514。

163 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1 後泛臯記，頁127。

164 江盈科，《雪濤閣集》，卷1 書懷，見《江盈科集》，上冊，頁43。

165 朱自清，論書生的酸氣，見《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上冊，頁163-170。

166 唐順之，《唐荊川先生文集》，卷8 答金前涼郡守，集部第116冊，頁100。按：唐氏亦言，「清修之士好言貧」。可見，言貧是明代文人的一種習氣。

167 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1 後泛臯記，頁127-128。

今人陳璋論文人道，文人絕非一般舞文弄墨的酸丁秀才，而指具有極致的文人氣質的一類知識分子。他將文人氣質概括為「五氣」，即：書卷氣、骨氣、正氣、義氣、清氣。¹⁶⁸ 這當然是今人理想化了的文人形象。但如果對明代文人作一具體考察，那麼酸丁秀才或鄉村學究在文人階層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就不能不給予充分的注意。事實上，書卷氣是明代文人普遍具有的一種精神氣質，即使鄉村學究如何窮酸，他們總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因這種知識是他們維持生計的基礎。文人當然是傳統讀書人的一部分，故又可稱「書生」。這固然是一個頗值得驕傲的稱謂，如說「一介書生」或「書生本色」，無不都含有清高的意味。所以明代的文人墨客大多以貧為清高，進而以清高為標榜。骨氣也者，簡言之，即傲氣。文人無疑是知識的掌握者，而知識又賦予文人以超俗的權力和優越。於是，明代文人也就具有了笑傲王侯、指點江山的傳統，潛意識中常凌駕於世俗權力之上。¹⁶⁹ 至於正氣、義氣，亦即臨難盡節盡忠，更多的是在講學家之流中可以找到。而繼承魏晉以來文人傳統的文人，反而具有一種非道德或非規範的特點。即以「狎邪」為例，文人並不視之為大惡。其上焉者，視之為風流雅事，著之詩歌；其下焉者，視之為應酬不可免之事，無傷道德。¹⁷⁰ 這不僅是歷代文人的通病，而尤以明代文人為甚。換言之，明代文人一方面追求清雅之事，如書畫、文學，另一方面又追求相當世俗化、物質化的生活，甚或追逐聲色犬馬。

八、餘 論

由上述對明代文人的具體辨析，已不難對其作一概括：明代文人固然是整個知識階層的一部分，具有讀書人階層所具有的一切共性，但明代文人與前代文人相較，又別具個性特徵。舉凡布衣文人的增多，從而形成了一個與文臣有異的相對獨立的布衣文人層；文人與學者尤其是道學之士的區別，尤

168 陳璋， 等待文人， 《戲文》，1999：4，頁79。

169 相關的評述，可參見蔡翔， 金聖歎與阿Q， 見氏著，《寫在邊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104。

170 胡適， 提倡禁嫖， 見丘桑主編，《大宇宙中談博愛》（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74。

其是在個人習性與生活觀念方面，出現了文人與道學之士的分化現象；文、武關係在明代的具體演進，以及晚明出現的武人「尚文」與文人「尚武」習尚所反映的文、武滲透。如此等等，均可以視作明代文人的特性。即使是歷代文人的共性，諸如文人相輕，文人輕薄、無行，文人窮酸而願意言窮、哭窮，也因明代文人的活動而更加發揚廣大。換言之，就文人業餘精神的形式，也即繪畫、書法以及案頭清供品的製作諸方面而言，從王羲之到文徵明、唐寅，從倪雲林到董其昌，¹⁷¹無不有其一脈相承的精髓。但無論是明中期吳中風流才子型的文人所表現出來的「狂」、「簡」二科特徵，抑或王裒登、陳繼儒乃至李漁山人清客型的文人，既是文人業餘精神（即明清文人所言的「閑情」）昌盛的產物，同時也可以說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自晚明開始而直至清代的明清社會與文化的巨變。

有學者將明代視之為文人業餘精神最昌盛的時代，而明代文化也是「最典型的文人業餘文化」。¹⁷²這種觀點的論據則是明代科舉八股的考試制度，導致知識階層的知識學習，既不是入仕以後必需的專門技能，也不是純粹的業餘知識，不過是一種敲門磚而已。而科舉階段的學習，無疑又為文人的業餘生活提供了方便。這種觀點無疑有其存在的價值，事實上也部分概括了明代文人和文化的特質。然揆之明代事實，這種觀點無疑具有一些片面性。如若具體考察晚明的文人畫或小品文，這種說法顯然是成立的。然明代文化並非如此簡單，業餘精神也並不是明代文人的惟一精神。簡言之，明代文化與文人相關的主要內容有：一是明前期的宮廷畫，尤其是浙派，以及與之相應的翰林院的文學侍從之臣，及其由此形成的臺閣派詩文，或嘉靖年間專寫「青詞」的侍臣。他們供奉或侍從於內廷，業餘精神被御用的職責所掩蓋。¹⁷³二

171 董其昌無疑是晚明文人的代表人物。關於他的生平及繪畫、書法作品的介紹，可參見 Paul Moss, *The Literati Mode: Chinese Scholar Paintings, Calligraphy and Desk Objects* (London: Sydney L. Ltd., 1986), pp. 1-3.

172 Joseph R. Levenson 著，張永堂譯，從繪畫看明代及清初社會的業餘精神，收入《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 422。

173 關於明代宮廷畫派，尤其浙派之演變，可參見穆益勤編著，《明代院體浙派史料》（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頁 89-110。而明初以宮廷畫與臺閣體詩為主要內容的宮廷文化，其評述可參見陳寶良，《悄悄散去的幕紗——明代文化歷程新說》（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頁 41-51。

是明代中期以後興起的通俗文化，以及創作這些文化的作家，尤其是下層文人。這種通俗文化，其標誌當然是印刷業的商業化和新的文學集團的出現，而其特點則為適應較少文化的新的大眾的口味。¹⁷⁴最後方是文人畫、小品文以及與此相關的文人業餘精神。它在晚明的表現，始於公安、竟陵，而至清初的李漁，無疑已到了總結的階段。¹⁷⁵

晚明文人的業餘精神，究竟是什麼？簡言之，就是基於一定經濟基礎或穩定生活之上的消閒精神。反映到文人畫中，或稱之為一種「反科學」、「反進步」、「反商業」、「反實用」的精神。¹⁷⁶文人畫一詞最初由明人唐寅提出，是指「士大夫畫」，後用以指南宋畫。文人畫的精髓是「士氣」，以與「畫工氣」相別。而「士氣」的獲取，則是多讀書。這也是文人的特權，是畫工無法享受的特權。基於此，才造成文人畫與畫工畫的美學區別，即文人畫以「平實簡淡」為極詣，下筆性靈，任意馳騁，隨處飄灑。¹⁷⁷然即使是純粹的文人業餘精神，在晚明也受到整體文化世俗化的影響，表現出一些俗化傾向。這一點尤其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至於晚明存在的數量龐大的下層知識分子，也即生員，他們與傳統文人的關係，在文人階層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以及所起的作用；或者明代文人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所佔據的特殊地位，則無疑將成為以後研究的方向。

174 Anne E. McLare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d Ming Chantefables*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1998), pp. 1-2.

175 關於明清時期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的形成，尤其集中考察李漁者，可參見 Chun-shu Chang and Shelley Hsueh-lun Chang,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ociety,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Li Yü's Worl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p. 1, 9-46, 231-266.

176 同註 172，頁 421。

177 相關的文人畫特徵，可參見歸昌世，《假庵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194-195、199、202-203。

Ming Dynasty Literati: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Baoliang Ch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terati (*wenren* 文人)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literati class, and conclude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iterati, civil officials (*wenchen* 文臣), neo-Confucian scholars (*daoxue jia* 道學家) and military officers (*wushi* 武士)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author also attempts to provide an appropriate proposal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s of the Ming literati.

While the literati belonged to the intellectual class and shared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m, they also formed a unique social stratum. When the scholar-recluses (*shanren* 山人) became a prominent social class in the late Ming, the literati separated from the scholar-officials (*shi* 士) becoming distinct from the civil officials, neo-Confucian scholars and military officers, with their own individual character, personality and lifestyle. In a broad sense, they were all members of the scholar-official class and possessed qualities common to the above three. Nevertheless members of each group did infiltrate and influence the others. The late-Ming literati became keenly conscious of their own status, and due to their great activity in scholarly pursuits, they did much more than the Confucian scholars or neo-Confucians to enrich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late Ming.

Keywords: literati, civil official, neo-Confucianism, military officer, Ming dynasty

* Baoliang Chen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